



中外

ZHONGWAI TAOCI WENHUA JIAOLI

陶瓷文化交流

詹嘉著

中国社会出版社



中外

ZHONGWAI TAOCI WENHUA JIAOLIU

陶瓷文化交流

詹嘉著

請張老師賜教

中国社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中外陶瓷文化交流 / 詹嘉著.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4.11 (新经典学者丛书 / 黄君主编)

ISBN 7-80146-720-5

I. 中… II. 詹… III. 文化史 - 研究文集 - 中国 - 历代
IV. K-G.06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4)第 008210 号

丛 书 名: 新经典学者丛书

书 名: 中外陶瓷文化交流

著 者: 詹 嘉

责任编辑: 张英杰

出版发行: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经 销: 各地新华书店

印刷装订: 北京振兴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850 × 1168 1/32

印 张: 8

字 数: 195 千字

印 数: 01-1000 册

版 次: 2004 年 11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7-80146-720-5/K-G.012

定 价: 22.00 元

(凡中国社会科学版图书有缺漏页、残破等质量问题,本社负责调换)

前 言

《中外陶瓷文化交流》终于脱稿了,我既感到欣慰、又感到不安,欣慰的是多年的夙愿得以逐步实现,可以向关心帮助我的领导、朋友有所交代;不安的是它将要面对许多专家、学者,他们是否认同、接受。但是,它毕竟对上下几千年、纵横几万里的中外陶瓷文化交流进行了耙梳、总结、概括,并把自己的认识、理解、判断融汇其中,姑且作为一家之言。

我对中外陶瓷文化交流的研究,源于十五年前一个梧桐更兼细雨的黄昏,展卷《中国外销瓷研究》,其鲜活的内容、广博的知识深深地吸引了我,特别是中国陶瓷文化巨大魅力令我不能自己,当看到她融入朝韩的习俗、日本的茶道、东南亚的巫术、伊斯兰的朝圣、东非的墓柱、欧罗巴的艺术,我被一种难以克制的情绪而激动不已,作为景德镇的子民,应该系统地研究点东西了。于是有了《景德镇陶瓷与世界文化交流》、《江西古陶瓷与世界文化交流》、《中国陶瓷对日本陶瓷及茶道的影响》等省级研究项目,并发表了五十余篇论文,它们构成了本书的框架和内容。

《中外陶瓷文化交流》共分为五章 19 节,在陶瓷文化的引发下,沉静地把研究视野聚焦在中国陶瓷与世界文化的关系上,聚焦在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关系上,从文化属性来论证最具有地方色彩,最具有民族风格,就最具有国际性。中国陶瓷不但蕴藏

着历史、社会、政治、经济背景,而且包容着科学、技术、工艺、美学的内涵,在中国文化史,特别是中外文化交流史上占有极为重要的地位。中国陶瓷以精湛的技艺、丰富的产品、广阔的贸易市场、频繁的对外交流,自立于世界文化之林,与国内外人民的物质和精神生活息息相关。

陶瓷文化,是中国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古代政治逐渐开明,为发展工商业,改革匠役制度,降低工商税率,开拓交通创造了条件。随着造船工业及航海技术的进步,海上交往频繁,特别是郑和七下西洋,世界新航线的开辟,贸易制度的完善,促使资本主义经济因素进一步发展,与中国陶瓷一起蓬勃发展。

中国陶瓷作为日常生活用品,造型优美、质地坚硬、不易与食物发生化学反应,易于洗刷;作为艺术品,造型丰富、釉色绚丽,具有很高的欣赏价值;作为特殊用品,为不同民族、不同宗教、不同习俗而设计制造,具有鲜明的文化特征。餐饮具是人类饮食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只有我国瓷器出现后人们才找到了理想适用的饮食器具,迅速淘汰东南亚人民的饮食器具——茎叶果壳,淘汰了欧洲平民的饮食器具——木器陶器,部分地代替贵族的金银器具,几乎统治世界人民的餐具。东南亚的土著居民认为漂亮的陶瓷可以媚神,清脆的声音可以通神,陶瓷成了巫术的高级供品,陶瓷作为葬具摒弃了落后的葬俗。军持成了伊斯兰教徒朝圣的必备器物,青花瓷镶嵌成清真寺精美的图案,陶瓷艺术与基督教有机地融为一体,成为宗教的载体,凸现了其教育性。

中国古风吹遍世界各地,形成了中国陶瓷文化与当地的民俗文化、宗教文化、绘画艺术的奇特结合。阿拉伯工艺品受中国陶瓷的影响,在壶、钵、瓮等器皿上以简洁、流畅的线条描绘鸟兽鱼虫,在几何图形的基础上普及了抽象图案,讲究对称和反复,釉色丰富。在瓷器上镶嵌宝石和金丝、银丝,揉进了阿拉伯的风格。

中国陶瓷成为欧洲人的收藏品、礼品、婚庆的纪念品,“克拉克”瓷更是家庭不可或缺的陈设品。欧洲陶瓷画面上经常出现小

桥流水、亭台楼阁、柳树花卉的图案,尤其是法国出现了“蓬巴杜装饰”,给人以东方艺术的享受。十八世纪,当中国陶瓷风行欧洲之日,也正是罗可可艺术勃兴之时,意匠自然、飘逸、潇洒,西方艺术充分咀嚼中国艺术精髓,采用瓷器纤细淡雅的色调,成为罗可可艺术的蓝本。

瓷器被誉为中国的第五大发明,对人类文明产生了巨大影响。中国的彩陶、印纹陶、白瓷、青瓷、青白瓷、黑瓷、青花瓷、五彩瓷交相辉映,中国的越窑、邢窑、长沙窑、定窑、钧窑、磁州窑、耀州窑、汝窑、哥窑、景德镇窑、建窑、吉州窑、龙泉窑、德化窑、石湾窑、潮州窑、宜兴窑窑火连绵,对朝鲜、韩国、日本、越南、泰国、伊朗、土耳其、埃及、意大利、德国、法国、荷兰、英国的文化产生了及其深远的影响。

当中国陶瓷进入各国人民的生活领域、精神领域时,掀起了仿制中国陶瓷的热潮。高丽李朝陶瓷大量的吉祥图案,几乎就是景德镇陶瓷装饰图案的翻版,与朝鲜族的习俗和喜好相融合,并赋予新的含义。朝鲜取法景德镇,仿照青花釉里红生产了辰砂瓷器,在斗彩的影响下又仿制了青花辰砂瓷。日本青花瓷图案受明末画风影响,或粗犷或细柔,人物线条纤细,可以找到景德镇陶瓷的痕迹。中国黑釉茶盏与日本茶道融合,“天目盏”、“芙蓉手”更是茶道中的极品,促进了日本茶文化的发展。日本为获取青花瓷的制造方法,加藤四郎、伊藤五郎太夫在中国长期学习,掌握了青花料的运用和烧成,烧制日本青花,并仿制景德镇斗彩、釉里红等。十六世纪初期,中国陶瓷工匠在波斯的伊斯伯罕烧造瓷器,并传播到叙利亚和埃及,阿拉伯人把从中国学到的技术又传到意大利,荷兰的德尔夫特、德国的迈森较早仿制景德镇青花瓷,又辐射整个欧洲。法国传教士昂特雷科莱长期在景德镇研究陶瓷的原料构成、制造方法、釉料配制、装饰艺术、烧成温度,并把它介绍到欧洲,推动了欧洲陶瓷的生产。

各民族的文化艺术形成,不可能摆脱外来影响,景德镇陶瓷

是中国文化灿烂的明珠,折射着世界文化的光辉。明代景德镇陶瓷使用的青花料时而为国产的土青,时而为外国的青料,输入的青花料为苏泥勃青、回青,在法国珐琅工艺影响下,景德镇生产了珐琅瓷和粉彩瓷,用东南亚的紫砷、紫矿、脂胭石生产霁红瓷,新彩是欧洲传入的装饰,表现力强。

佛教、伊斯兰教、基督教对中国陶瓷文化也直接或间接地产生了影响。佛教的传入、普及、中国化,与中国瓷器的发明、发展、繁荣同步发展,精神与物质的渗透必然影响中国陶瓷的发展,佛像、佛塔、力士、护法兽、菩提、忍冬和莲瓣成为陶瓷器型或装饰图案。伊斯兰教传入中国与商业贸易有着不解之缘,伊斯兰教认为真主是无形的,因此极力避免偶像崇拜,特别看重书法,故书法艺术作为装饰图案广泛运用于工艺品,中国陶瓷以阿拉伯文、波斯文作为装饰纹样,其鼓腹花瓶、扁肚葫芦瓶、双耳瓶也成了仿制的范例。西方科学文化与圣经的教义一起在中国传播,圣经故事在“订烧瓷”中较为普遍,欧洲的金属、玻璃、珐琅等制品成为中国陶瓷的范例,还烧制特殊的“纹章瓷”。

本书吸取了政治、经济、文化研究的最新成果,以历史和文物资料为依据,论证了中国陶瓷的博大精深受惠于中外文化,中国陶瓷与世界文化交流具有历史必然性:疆域的接壤,方便了人们的交往;贸易的发展,刺激了人们的需求;航海技术的进步,扩大了交流范围。新颖的推论方式,把陶瓷文献、史料、文物予以综合研究,把文化交流置于特定的历史背景中,做到历史、文化、逻辑的统一。

本书以文化传播学的视野、原理、方法,以不同时期为经,不同国家为纬,剖析中国陶瓷文化传播的历程及对世界文明的影响,从而形成新颖的构筑框架,呈现出时间上的流动性和空间上的稳定性。文化循着它自身的规律进行交流,较高的文化必然向较低文化流动,一种文化越悠久,文明越发达,它对周边文化所生产的辐射就越大,由实用价值转为艺术价值的中国陶瓷,循着这

一规律以其双重价值流传世界。中国陶瓷的胎质、型制、釉色、装饰所蕴含华夏文化广博内容、美妙意蕴、独特体系,是倾倒世界各民族的魅力所在。深刻地改变了人们的价值观念、行为取向、文化心态,促进了人类文明的发展。

本书是对中国经济腾飞的文化策应,对提升中华民族形象,增强华人的文化认同感和自信心,具有现实而深远的意义。无论是中外文化交流史,还是陶瓷专门史,中外陶瓷文化关系的研究几乎是空白,但是,它的内容又是如此丰富,广泛涉及到政治、经济、文化、科技,以致于作为陶瓷专门史硕士点的研究方向,然而还没有一部囊括全国、贯通中外、资料完备、论断详明的著述,本书试图填补这一空白,促进陶瓷文化学科的建设。

目 录

前 言	1
第一章 中外陶瓷文化交流的历史背景	1
第一节 汉魏晋中外陶瓷文化交流的历史背景	2
第二节 隋唐中外陶瓷文化交流的历史背景	8
第三节 宋元中外陶瓷文化交流的历史背景	19
第四节 明清中外陶瓷文化交流的历史背景	37
第二章 中国陶瓷对世界文化艺术的促进作用	58
第一节 中国陶瓷对亚洲文化艺术的促进作用	59
第二节 中国陶瓷对非洲文化艺术的促进作用	92
第三节 中国陶瓷对欧洲文化艺术的促进作用	97
第三章 中国陶瓷对世界陶瓷生产的推动作用	114
第一节 中国陶瓷对朝韩陶瓷生产的影响	115
第二节 中国陶瓷对日本陶瓷生产的影响	124
第三节 中国陶瓷对东南亚陶瓷生产的影响	135
第四节 中国陶瓷对西亚北非陶瓷的影响	140

第一章 中国陶瓷对外交流的历史背景

中国陶瓷文化源远流长,广博浩瀚为世界仅见,是古代文明的典范。从中外陶瓷文化交流史来看,汉代张骞、班超出使西域,使我国和中亚、西亚各国外交商贸日益频繁,魏晋与周边国家保持着密切联系。唐代政治稳定,农业和手工业发展,商业活动也逐渐突破了市、坊限制,大城市出现了夜市,还产生了柜坊和飞钱。唐代中期,沟通东西方的丝绸之路受到复杂的政治、军事的影响屡告中断,通过海路与世界经济文化交往得以迅速发展。唐朝一改前代以政治外交为主,转向以经济、贸易为主的发展轨道。唐朝沙船、福船、广船都已成形,适航、续航性能较好。

宋代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和城市人口的增加,彻底打破了坊、市界线,商店可以随处开设,政府对商税特别重视,在全国各地设置场、务等机构,专门征税,出现了世界最早的纸币——“交子”。十至十三世纪初,丝绸之路东西两端战事不断,造成严重的梗塞,断绝了陆路进口香料等货物的渠道,不得不致力于海上贸易的拓展。宋代海外贸易发达,造船业有官营、民营作坊,最大的载重量为1100吨,可远涉重洋,吃水深,抗风浪能力强,船上设备齐全,正朝海上强国的方向发展。元代是历史上唯一横跨欧亚大陆的政权,将中国文化最西边界推进到美索不达米亚,加速了蒙古政权和穆斯林文化的结合,十三世纪以后,贸易由政府直接管

理,采用专卖的办法垄断资源,控制市场,泉州号称“世界最大港口之一”。

明朝制瓷业、棉纺织业、矿业和造船业发展最为迅速,商业资本转化为生产资本,明朝海外贸易随着政治形势发展时宽时严。郑和七次出使西洋各国,加强了海防,极大地促进了对外贸易。随着商舶贸易兴起,贡舶贸易走向衰落,牙行制度的完善,规范和促进了对外贸易。清朝具有资本主义性质的手工作坊和手工工场得到发展,商业十分繁荣,开海设关鼓励贸易是主流,实行“以官制商,以商制夷”,亚洲、欧洲、美洲主要国家都与中国直接贸易,贸易额为中国古代之最。明清造船业非常发达,尤以广东、福建为盛,航海技术日益成熟,特别是地圆学说的确立,世界新航线的开辟,刺激了贸易往来和文化交流。

第一节 汉魏晋中外陶瓷文化交流的历史背景

汉代张骞、班超出使西域,使我国和中亚、西亚各国外交商贸日益频繁,使通往西亚各国的“丝绸之路”重新畅通无阻,增进了汉族与西域各族人民的友谊。据《汉书·地理志》记载:中国船舶可到马来半岛、印度、斯里兰卡。魏晋时期,中国与周边国家保持着密切联系,南方的建康、番禺,北方的洛阳、长安都有外国使者和大批商人,中国也有使者和大量商人到外国去,广州逐渐取代徐闻、合浦,海舶已能通过马六甲、孟加拉湾、阿拉伯海进入波斯湾、红海,从苏伊土地峡进入地中海,成为中国对外贸易的重心。由海道来广州的外国僧人、商人、使节越来越多。

一 汉代

中国陶瓷对外传播不晚于汉代。汉代打击地方割据势力,加强中央集权、改革财政、发展经济。农业生产主要表现在牛耕更加普遍,铁制农具进一步推广,水利工程大量兴建,耕作技术有了明显改进。手工业主要表现在冶铁、纺织、陶瓷的发展,特别是瓷器出现后,商业更加繁荣,富商大贾“周流天下”,甚至“富埒天子”、“交通王侯”,势力很大。长安是全国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在世界城市史上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洛阳、临淄、邯郸、江陵、苏州、广州都是著名的大都市,广州还是对外贸易的重要港口。

为了适应中西交通往来和经济文化交流,西汉政府在西域设立亭障,便利各国使节和商旅交通往来。张骞出使西域,使我国和中亚、西亚各国外交商贸日益频繁。西汉王朝同西邻正式建立了联系,并同罗马帝国建立了间接联系,形成了连接中国、印度、两河、埃及、希腊和罗马的欧亚古典文明带,中西双方的经济与文化交往步伐不断加快,规模也越来越大。最重要的表现就是丝绸和陶瓷贸易的增长。

秦汉时期,通过新疆的中西陆路交通从长安出发,经敦煌、鄯善、于阗、龟兹、疏勒等地,越葱岭到大宛康居、奄蔡可达安息,由安息向西到达大秦(罗马帝国),成为当时经济交流的大动脉。我国到东南亚各国的通道,除陆路经中亚、缅甸外,还有海道。据《汉书·地理志》记载:船舶从合浦郡的徐闻县出发,行五个月可到马来半岛,又继续航行四个月,抵达缅甸,从缅甸蒲甘城附近再乘船航行,最后抵达印度。回程从印度启航,先到斯里兰卡,经过八个月抵马来半岛,转向东北航行回国。《汉书·地理志》还记载:“汉武帝时,我国商人就带着丝绸和黄金从徐闻、合浦乘船启航去南洋诸国,购买明珠、璧琉、奇石、异物等。这时的航程远达马来半岛境内的都元国、波宗国;缅甸境内的邑卢没国、谶离国和

夫甘都卢国；印度境内的甘支国、已程不国和斯里兰卡等……自汉武帝以来皆献见，有绎长，属黄门，与应募者俱入海，市明珠、璧琉、奇石、异物，赍黄金杂缯而往。所经国皆禀食为耦，蚩夷贾船，转送致之。亦利交易，剽杀人。又若逢风波溺死，不者数年来还。平帝之始中，王莽辅政，欲望威德，厚遗黄支玉，今遣使献生犀牛”。

张骞通西域前，丝绸之路已经出现，中外商人不怕长途跋涉和艰难险阻，“丝绸之路”就是这样形成和改善的。汉初匈奴兵犯不止，阻塞了西域的道路，张骞通西域后还是时通时阻，直至汉武帝发兵大败匈奴，匈奴远遁中国，通往西方的道路才畅通无阻。匈奴虽然与汉朝政府为敌，但并不完全与和平的商人为敌，他们收了商人的礼品或过境费后，就可以放行，而且匈奴也要同各地区进行贸易，介于中国和伊朗之间还有许多国家，商队可以逐国停留，补充给养和交换商品，丝绸之路对于来往客商基本上是开放的，不过国与国的关系有时紧张恶化，就会出现障碍或中断的情况。

东汉班超在西域30余年，使通往西亚各国的“丝绸之路”重新畅通无阻，从此西域地区和中原的经济文化联系更加紧密，增进了汉族与西域各族人民的友谊。97年，班超曾派副使甘英出使大秦国（罗马），一直到达条支海（波斯湾）。甘英这次出使虽然没有直接开辟与大秦通商的道路，但也反映了东汉要与欧洲建立贸易关系的愿望。97年，缅甸北部的掸国王雍由调派遣使臣向汉王朝赠送珍宝，东汉政府则以金印回赠，102年，雍由调再次遣使来汉，并“献乐及幻人”，缅甸的音乐和杂技，在当时深受中国人欢迎。

东汉王朝与朝鲜、日本、越南的联系更加紧密，中国的耕种技术、陶瓷技艺、纺织技术、冶铁技术的传入，促进了他们的经济发展。166年，大秦商人来到中国，以大秦王安敦的名义赠送汉恒帝礼物，此后汉与罗马的贸易关系更为频繁，印度、缅甸等国与中

国的关系也更为密切。汉明帝派蔡愔去印度取经以后,印度的僧侣大量来到中国。除官营海外贸易外,私营的海外贸易早已存在,并不断发展。汉代与朝鲜、日本、越南、印度、印尼、缅甸、马来西亚等国进行经济文化交流,并通过“丝绸之路”与中亚、西欧建立了经常的贸易关系。汉代,佛教开始传入中原地区,并在统治阶级中间开始流传。中国的陶瓷、丝绸、冶铁等技术传入国外。

中国是最早使用车的国家之一大约在4600年前的黄帝时代已经创造了车,《左传》说吴仲担任夏朝的“车正”。车辆的使用,使生产力大幅度提高,游牧经济得以确立,商业活动日益扩大。车辆基本为双轮马车,但也有四轮马车,车辆结构一般为双轮、单辕、轴舆各一,车舆居两轮之间,车轮大多都有辐条,比现代畜力车简陋,如当时的车辆只是单辕条,而现代畜力车则为双辕,但整个车体已较为合理,用于交通运输,其功用基本与现代畜力车一致。

最早的筏和独木舟在中国原始社会末期已经问世,最早出现的木板船叫“三板”,由一块底板和两块舷板构成。春秋战国时期,江南有造船的工场——船官,诸侯之间常用船只往来,吴越水师称霸于“三江五湖”,亦雄踞于东海。吴王寿梦时曾派水师从海上去攻打齐国,越王勾践来吴之后,欲霸中原迁都琅琊,在海上建立了一支庞大的舰队(戈船队)。楼船是吴越水师最大的战船,楼船在两汉得到普及,据汉刘熙著《释名·释船》载:当时的楼船首上起楼三层,在甲板上设多层矮墙,如城堡状,汉武帝极重视楼船的建造。据汉书《朱买臣传》载:武帝派买臣到吴地“沿楼船,备粮食,水战具”,苏州是重要的水军基地。在庐江郡设“楼船官”,浔阳成为建造和停靠楼船的基地,汉代楼船的基地还有豫章、白章(慈溪)。

中国船舶很早就使用了风帆,帆船最大的进步是从方形帆发展成使用四角帆的纵向帆装置(特有帆、桅型式),这样船就可以顶风航行,据说中国平底帆船上的四角帆是世界最早的帆,这种

帆是斜桁风,汉代已经使用四角纵向帆。三国时期,万震写的《南州异物志》清楚地记载使用这种帆装的船,例如有些船承载 700 人和 260 吨货物。万震讲到有四根桅杆的船:“其四帆不正前向,皆使邪移,相聚以取风吹,风后者激而相射,亦并得风力,若急则随即减之,邪张相取风气,而无高危之虑,故行不避迅风激波,所以能疾”。公元 260 年,康泰叙述了有七根桅杆的船,这些船远航至叙利亚,万震确信早在公元三世纪,在广州附近的南方地区,中国人已经知道避免船因无风而停止不动的最好办法,是在桅杆后再竖立一根桅杆,他们并不是简单地沿着船心的纵向竖立一排桅杆,而是横向交错地两边竖立桅杆。

要抢风转变航向就必须有纵向帆,在这种帆的装置里,桅不再是挂着帆的长杆,而是当船抢风转变航向时可以使帆在左右迎风转动的枢轴。当逆风航行时,抢风转变航行,船往往会经历较长时间背风漂浮,船不得不左右漂动,前进十分缓慢。因此,又发明了浮板(横漂抵板),实际上这是从航向的背风面放入水里的一块木板,以增加对水的压力,防止漂浮,同时也使船和航向不偏斜。李约瑟指出:“中国的平衡四角帆的确是人类在利用风力上取得第一流的成绩。”无论在索具、导航、动力装置或操舵等各个方面,欧洲人都吸收了中国的经验。

二 魏 晋

魏晋时期,中国与周围国家保持着密切联系,南方的建康、番禺,北方的洛阳、长安都有外国使者和大批商人,中国也有使者和大量商人到外国去。东吴至南朝,由于广州的地理条件更为优越,水陆交通便利,广州逐渐取代徐闻、合浦,成为中国对外贸易的重心。此后,广州的海上贸易日益兴旺,由海道来广州的外国僧人、商人、使节越来越多,这一时期前来广州通商国家和地区有大秦、天竺、狮子国(斯里兰卡)、罽宾(克什米尔)、占婆(越南

南方)、扶南(柬埔寨)、金邻(泰国境内)、丹丹(马来半岛南部)、槃槃(加里曼丹北部)、诃罗单(爪哇岛)、干陀利(苏门答腊巨港)、婆利(印尼巴厘岛)等。从广州出发的海舶已能通过马六甲、孟加拉湾、阿拉伯海进入波斯湾,以及幼发拉底河进入红海和地中海。

226年,大秦商人秦伦来到建业,受到孙权的接见。西晋初,大秦又派使者来到中国。245—250年间,孙吴曾派遣中郎康泰和宣化从事朱应出使林邑(越南南部)、扶南(柬埔寨)等国。东南亚国家不断派遣使者到中国来,扶南遣使来中国就有三十多次。越南交趾是中国和西方、南海诸国商使来往必经之路,经过长期往来,中国的制酒、养蚕技术传到越南,并开始推广,越南的琉璃技术也传入中国,使我国的琉璃制造技术,在原有的基础上有新的提高。这一时期朝鲜半岛分为高句丽、百济、新罗,他们同中国南北朝保持经常往来。

南朝的宋梁政府应百济的请求,曾把《涅槃》等经义、工匠、画师等赠给百济,朝鲜的语言吸收了不少汉语词汇,很多人能用汉文写作,朝鲜的《箜篌引》乐曲和新罗的伽倻琴等乐器也传入中国。455年,波斯萨珊王朝遣使来华,直到西魏信使往来不断。大秦等国的石棉布、水银、硫磺、药材和汗血马等输入到中国,中国的丝绸、陶瓷、铜器等输出到大秦、波斯等国。六世纪末,中国的养蚕技术通过波斯传入大秦。由于海上交通的开辟,中国同南亚各国的联系加强了。佛教在中国传播以后,僧侣的往来经常不断。中国与日本语言文化交流逐步频繁,四世纪不少中国纺织工、养蚕和缫丝能手、裁缝师、陶工以及厨师都移居日本,带去中国先进的技术,日本开始采用中国文字。